

#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中东史研究\*

王铁铮\*\*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中东史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9~1978 年，主要是培养和储备人才，设立相关研究机构，组建最基本的研究队伍。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是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译著，为新中国的中东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是 1978~2010 年，中东史研究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围绕中东史开展的各种相关研究全面铺开，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东史研究新学科。第三阶段是 2010 年至今，中东史研究不断向纵深领域拓展，主要研究对象开始转向综合性的地区或中东国家通史，以及对区域性大国、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的专题性探索，一些成果体现出较高的研究水准。另外，我国的中东史研究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尚需国内中东学界同仁们不懈地共同努力。

**关键词** 新中国 中东史 70 年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东研究，国内学者在不同时期撰写了一些专题文章，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主要包括：柯蒂的《我国中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亚非洲》1988 年第 2 期；张毓熙的《新时期十五年我国中东学著作出版情况综述》（一）和《新时期十五年来我国中东学著作出版情况综述》（二），分别发表在《西亚非洲》1994 年第 4 期和第 5 期；姚大学、李芳洲的《新中国中东史研究五十年》，《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

\* 本文为笔者应邀出席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首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提交的论文以及受邀参加“教育部委员会历史学学部 2019 年度工作会议暨七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研讨会”的发言稿。

\*\* 王铁铮，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版) 2005 年第 1 期; 李芳洲、姚大学的《改革开放 30 年中东史研究述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1 期; 李荣建、方长明的《近 30 年来中国阿拉伯史研究综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 年第 4 期; 宫少朋的《新中国中东研究六十年》,《西亚非洲》2009 年第 10 期; 等等。总体而言,上述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全面介绍和评述新中国中东研究的状况,其中也涉及中东史研究的相关内容;另一类是专门论述新中国的中东史研究。而后者以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姚大学和李芳洲撰写的两篇文章最为突出。这两篇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勾勒了新中国中东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同时,文章提供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字丰富而翔实,基本囊括了新中国不同时期中东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此外,文章还对我国中东史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及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提出了看法。本文是在吸纳上述各类研究信息的基础上,根据笔者多年来掌握的一些相关资料,综合梳理和分析而成的。

中东史研究属于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我国世界历史研究领域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一个新兴学科。新中国的中东史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49~1978 年为第一阶段;1978~2010 年为第二阶段;2010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 年),我国初步建立了最基本的中东史学研究队伍,同时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成果。随着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对内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对外发展同周边和友好国家的关系,成为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上半期逐步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1954 年 9 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希望同中东、近东国家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正是从 1954 年起,京、沪两地一些高校开始陆续设立与中东国家相关的语言专业,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此外,北京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也开始招收我国首批亚洲史和世界上古史的研究生,其研究领域涉及埃及和土耳其等。一批苏联专家亦曾帮助中国培养这些早期的研究生。这些研究生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中东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并为我国的中东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1955 年万隆会议后,新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在此形

势下，国家选派留学生赴中东国家深造的工作得到加强，后来也有一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成为中国中东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我国也在酝酿设立相关研究机构。1956 年，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内设西亚非洲组；1959 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筹建亚非研究所，内设西亚非洲室；1961 年，中联部建立西亚非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64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建立宗教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成为该所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此外，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欧 14 国，国内的高校于 1964 年又建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包括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1978 年改名为中东研究所）、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这些机构成为中国高校中第一批以中东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尽管上述研究机构的陆续建立为中国的中东史研究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特别是受“文革”的严重干扰，各相关研究机构对全面的中东史研究尚不能做出切实的规划和付诸实施。在这一阶段，国内学界虽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关中东的一般性或普及性读物，但尚不能进行比较细化的成果分类，因而也不能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中东史研究。然而，在遭受“文革”严重干扰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组织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出版等单位的力量，集中翻译的 30 余部有关中东国家的著作作为新中国开展全面的中东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译著大多经过认真筛选，分别译自英语、俄语、法语、阿拉伯语等语种，主要由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陆续出版。这批译著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所选著作几乎涉及所有中东国家，其中包括地区史、国别史、人物传记和各类专题研究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宗教等，是迄今为止新中国启动的有关中东国家著作翻译的最大工程。二是译著涉及多个语种，译者多为国内各语种和相关专业人员中的骨干。同时承担翻译任务的各单位都予以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这些措施确保了所出版的译著普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三是所译原著大多由相关国家的著名学者或是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专家撰写，所用文献史料丰富而翔实，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研究对象的基本史实，使它们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从事中东问题和中东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文献，同时也成为新中国

开展中东史研究初期的标志性成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的中东史研究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步的。

第二阶段（1978~2010 年），我国的中东史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东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一是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及作为世界三大一神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尤其是伊斯兰教固有的政教合一特点，使中东伊斯兰教的动向对世界穆斯林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因而在“二战”后中东地区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点”，其扑朔迷离的政局变化对地区乃至世界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二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和中东国家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往不断加强，中东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交往和能源供应地。仅以石油进口为例，中国自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4 年石油进口突破 1 亿吨；2007 年石油进口达到 1.98 亿吨。而中国从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一直占中国石油进口的大约一半，2008 年中国从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约占原油进口总量的 56%。在经贸来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六国业已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在政治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社会需要在世界政治舞台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这当然也包括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等。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国急需相应加深中东国家的认知。2002 年“中共十六大”后，中国提出了“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外交方略，中东国家被界定为“周边国家的延伸”，中国外交部在这一年首次设立“中国中东问题特使”，至今已更换四任，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对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的重视。同时这也为国内中东学界进一步全面和系统研究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故此，1978 年后，国内的中东史研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新变化。

1. 新增的中东研究机构相继在国内高校成立。例如，西南大学西亚地理研究所和伊朗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主要侧重对中东史的研究）、宁夏大学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等，在 1978 年之后陆续成立。这些新增机构大多依托于高校，并以中东史和相关的中东专题为研究对象，从而增强了中东史研究的力量。

2. 中东史学科点的设立及其对博、硕士研究生等各类人才的培养有助

于我国学术界对中东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重新恢复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制度。80年代初,培养中国中东史方向研究生的工作在国内开始启动。1986年,西北大学彭树智教授由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该校被授权设立属于世界史二级学科的“世界地区国别史、中东·南亚史”博士点。西北大学由此成为中国最早专门招收和培养中东史专业博士生的单位。1995年,该校又经国家批准设立“历史学科流动站”,开展中东史及相关专业博士后科研合作与指导工作。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逐步发展为我国从事中东史研究和中东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90年代中后期,教育部调整研究生专业和招生范围,组成历史学一级学科,世界史成为隶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这次调整使一些高校获得招收和培养中东史方向研究生的授权。一些相关大学就是在这次调整后相继开始招收和培养中东史方向或相关方向研究生的。博士点和博士生招生人数的逐年增长使我国的中东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3.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中东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营造了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中东研究的专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留学深造,参加国际研讨会,开展合作研究,获取大量最新图书文献资料和各种研究信息,从而为我国开展中东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1978年后,我国的中东史研究出现繁荣局面,一大批新的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据不完全统计,1978~2008年,各类报纸杂志发表中东史研究论文1989篇,占中东研究论文总数5878篇的34%;公开出版中东史研究著作310部,占中东研究著作总数758部的41%。已发表和出版的中东史研究论著大致分为中东通史类、中东断代史类、中东国别史类、中东专题史类,以及工具书类。现就中东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扼要介绍如下。

1. 中东通史类。主要著作有:郭应德著《阿拉伯史纲》,1991年;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1991年;纳忠著《阿拉伯通史》(上、下卷),1997年、1999年;姚大学、王泰主编《中东通史简编》,2001;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研究生教学用书),2002年;等等。这些著作诠释了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民族怎样由分散状态,逐渐发展为彼此联系的、综合的和整体的阿拉伯世界,同时兼及其他与阿拉伯世界密切相关的中东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1999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启动该校“211工程”

重点资助的中东历史研究基本建设项目——13 卷本《中东国家通史》的研究和写作，彭树智教授担任主编，全书包括《阿富汗卷》《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巴勒斯坦卷》《伊朗卷》《土耳其卷》《约旦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塞浦路斯卷》《也门卷》《埃及卷》《海湾五国卷》，共计约 400 万字。全书各卷以历史叙述方式阐明各国历史变迁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并以文明交往论为线索，探讨相互间内在的互动关系。全书在 2000~2007 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的 8 卷先后被多次重印。这套著作在 2009 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此外，彭树智教授还在 2010 年主编了独卷本《中东史》等。

2. 中东断代史类。此类成果主要有：郭应德著《阿拉伯中古史简编》，1987 年；刘文鹏著《古代西亚北非文明》，1999 年；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2001 年。这些成果对特定阶段或特定时期中东国家历史演进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进行了深入探究。

3. 中东国别史类。此类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中东区域性大国或重要国家的研究。主要成果包括：杨灏城著《埃及近代史》，1985 年；刘文鹏著《古代埃及史》，2000 年；杨兆钧编《土耳其现代史》，1990 年；徐向群、余建华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1994 年；孙正达等著《以色列国》，1998 年；张倩红著《以色列史》，2008 年；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1993 年；马晋强编著《阿富汗今昔》，1993 年；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亚室编著《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1985 年；王铁铮主编《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1997 年；李铁匠著《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1993 年；赵伟明著《近代伊朗》，2000 年；冀开运、蔺焕萍著《二十世纪伊朗史——现代伊朗研究》，2002 年；等等。

4. 中东专题史类。此类著作影响较大的有：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1990 年；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1991 年；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1996 年；吴云贵、周燮藩著《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2000 年；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2000 年；刘中民著《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2005 年；东方晓主编《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1999 年；刘靖华、东方晓著《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2000 年；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1997 年；

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2000年；哈全安著《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2006年；刘竞、安维华主编《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1994年；王京烈主编《当代中东政治思潮》，2003年；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2005年；王三义著《工业文明的挑战与中东近代经济的转型》，2006年；刘竞等著《苏联中东关系史》，1987年；张士智、赵慧杰著《美国中东关系史》，1993年；江淳、郭应德著《中阿关系史》，2001年；赵克仁著《美国与中东和平进程研究》，2005年；徐向群、宫少朋主编《中东和谈史：1913—1995》，1998年；季国兴、陈和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1987年；车效梅著《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发展与嬗变》，2004年；张俊彦著《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1986年；沈福伟著《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1998年；蒲慕州著《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化史》，2003年；潘光等著《犹太文明》，1999年；等等。上述著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价值。

5. 工具书类。中东史研究中重要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也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包括：刘竞主编《中东手册》，1989年；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1994年；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2000年；钟冬编《中东问题80年》，1984年；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1999年；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小辞典》，2006年；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2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各研究所和相关机构联合组成《列国志》工作室，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列国志》丛书”的研究和撰写任务，这套丛书截至2013年9月出版了144卷，其中包括20余个中东国家。《列国志》丛书各卷统一设定为七章的构架，即国土与居民、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教科文卫和外交。有关中东国家的《列国志》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牵头组织各方力量撰写，提供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数据堪称中东史研究入门的指南。2013年起，新版《列国志》丛书开始陆续出版，截至2019年12月，已出版的中东国家的新版《列国志》包括《科威特》《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以色列》《约旦》《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等。

除此之外，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还翻译一批有关中东史的著作，主要包括：〔美〕费希尔著、姚梓良译《中东史》（上、下册），1979年、1980

年；〔美〕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下册），1979年；〔英〕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2000年；〔德〕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孙硕人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1985年；〔英〕理查德·艾伦著、艾玮生等译《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肥沃的新月地带》，1981年；〔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1982年；〔以〕阿巴·埃班著、阎瑞松译《犹太史》，1986年；〔英〕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1992年；〔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著、傅有德等译《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1996年；〔美〕乔纳森·D. 萨纳著、胡浩译《美国犹太教史》，2009年；〔日〕田上四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东战争全史》，1985年；〔英〕迪利普·希罗著、叶进等译《中东内幕》，1986年；〔美〕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2006年；等等。上述译著为中国的中东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和参考系。

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我国的中东史研究不断向纵深领域拓展。这一时期的中东史研究逐渐转向对整个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综合性的通史研究。同时，对于中东的地区性大国、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的专题性探索更趋全面、系统和深入。

2010年底，以北非突尼斯的“布瓦吉吉事件”为导火线，在中东地区引发的政治剧变，瞬间在阿拉伯国家蔓延，并先后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形成五大“热点”，最终导致前四个阿拉伯共和制政权的垮台和更迭，而叙利亚则长期处于旷日持久的血腥内战中。此次阿拉伯变局显示出内生性、突发性、连锁性和颠覆性四大特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由阿拉伯国家多年来积压的内外各种矛盾酿成的。人们需要从历史的维度对其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解读和反思。另外，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剧变及其后衍生的一系列变化，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是超常的，它使中东政局更加扑朔迷离，充满了不确定性。上述因素进一步凸显了对中东的区域性大国和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以及对整个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综合性通史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种状况促使国内的中东史和中东问题研究又呈现了一个小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今，国内中东学者陆续出版的各类涉及中东

史和中东问题的著作在 200 部以上。这些著作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东地区国别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埃及、土耳其、沙特、海湾国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在中东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的研究；第二类是专题性研究，包括中东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宗教、现代化、社会治理、思想文化等；第三类是中国驻中东各国的一些使节撰写的回忆录，这些著作以亲历者的身份论述了在各国的所见所闻，并对相关国家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评价，很有参考借鉴价值。在发表论文方面，根据对国内有关中东研究的三大专业期刊，即《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研究》《中东研究》，以及其他相关刊物发表的有关中东史和中东问题的论文的粗略统计，近十年国内学者总计发表论文约 2000 篇。和之前的同类论文相比，这些论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在史料占有、理论阐释和观点解析方面大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对中东史和中东问题的探究更加系统和深入，基本能够反映中国中东学者的治学风格。

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国内各级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中东史和中东专题研究的各类译著纷纷问世，比较重要的译著超过百部，其中分量最大的是由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东方出版中心联合出版的“世界历史文库”，其中包含了数十部中东国别史和地区史的译著。这些译著为 21 世纪中国中东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养分。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通史研究则被喻为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龙头。历史学及其分支学科形成和发展的标志，往往就表现在具有代表性的通史性学术著作上。因为从更整体、更综合和更宏观的角度看，通史的研究和编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并且在不同侧面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史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水平。<sup>①</sup> 故此，通史研究难度较大，需要具备各种相应条件。

中国的中东史学者经过多年的人力、智力和物力的积蓄，自 2000 年开始展开对中东国家的通史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成果。这些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部著作：一部是前文提到的由我国著名史学家彭树智教授主编，商务印书馆陆续在 2000~2007 年出版的 13 卷

---

①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3页。

本《中东国家通史》；另一部是由南开大学哈全安教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于 2016 年出版的 8 卷本《中东国家史：610—2000》。这两部著作体例不一，各有特色，均是国内中东学界通史类研究的重要成果。除此之外，自 2010 年以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有三项属于中东通史类研究：一是由笔者本人主持的“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项目，该项目已结项，成果将由商务印书馆于 2020 年出版；二是由郑州大学张倩红教授主持的“犹太通史”项目，2015 年立项；三是由西北大学韩志斌教授主持的“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项目，2015 年立项。未来几年，上述三个通史类项目的成果陆续出版将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添砖加瓦，也将进一步丰富世界史研究的内容。

从已出版的两部规模较大的多卷本中东通史著作来看，两部著作各自蕴含的重要价值无可置疑。但由于撰写时受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局限，这两部著作仍有一些缺憾或薄弱之处。例如 13 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当时笔者作为主编彭树智先生的助手和 13 卷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出于仿效现代西方通史类著作一般少设或不设注释先例的尝试，同时也出于对出版方注重可读性和读者面的考量，因而 13 卷本基本上不设注释，只对一些关键性的资料和著作做文内注。但根据该著出版后反馈的信息，不设注释确实给研究者引用书中的文献史料和相关数据带来了一些不便和麻烦，甚至多少会影响对其学术性的认定。此外，由于当时占有图书文献史料和研究力量的局限，13 卷中的《海湾五国卷》涉及五个国家，《叙利亚和黎巴嫩卷》涉及两个国家，这对深入探讨各国综合性的历史发展进程造成很大阻碍。受篇幅所限，卷中不得不删减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完整性和系统性。再以 8 卷本《中东国家史：610—2000》为例，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前后 30 年的时间里陆续完成的，各卷体例不很一致，仅就其整体性来说，似乎尚有进一步调整完善的空间。另外，这两部著作写作的内容最晚到 2005 年，之后中东国家又经历了巨大变化，作为通史性著作亦应有所反映或补充。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加之近年来不断推出的大量新的图书、各种数据、信息资料和解密档案等，以及多年来的人力、智力和物力储备，现已具备充分的资源条件启动新的大型中东国家通史的研究和撰写。故此，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目前正在酝酿和论证这一工程的可行性。基本思路是：对 13

卷本《中东国家通史》进行重大修订，将 13 卷扩大为 18 卷，即一国一卷。书名暂定为 18 卷本《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同时根据 13 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出版十多年来不断反馈的信息意见，对全书各卷逐一认真修订，包括对其中反馈意见比较多的个别卷本予以重写。我们希望在吸纳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努力做好 18 卷本《新编中东国家通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同时，我们也殷切地渴望得到世界史学界诸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恭听来自各位专家学者的建议，为我们启动 18 卷本《新编中东国家通史》的研究和撰写出谋献策，提供指导意见，以便我们对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新中国 70 年来的中东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新学科，推动着我国的中东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然而，这些成绩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例如：(1) 中东史研究属于基础研究，中国的中东史研究机构目前主要分布在高校，专业研究的队伍和力量分布不均衡，相互交流也不够充分，加之其他因素的局限，对有效规划和开展中东史研究的实质性合作构成一定制约。特别是国内真正能够担当中东史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物的学者太少，还不能满足中东史研究发展的需要。(2) 主要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高校少数研究单位，中国需要更多的中东史研究成果，以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互促进，推动中东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3) 研究队伍和人力资源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各研究机构中缺少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语种的学者也影响着中东史研究持续健康地发展。

[责任编辑：刘金虎]